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 20 世纪进行了两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这两大革命运动形成了两代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经历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次飞跃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这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这次飞跃闯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这次飞跃的转折点，中共十五大完成了这次历史性飞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经历了 20 年的曲折发展之后，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的卓越贡献。

中共十五大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

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一节 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毛泽东思想是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理论体系。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孕育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必须认识近代中国的国情。

所谓国情，从广义上说，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人口、国土面积与位置、资源、自然环境、历史传统，以及所处的国际环境等基本情况和特点的综合；概括起来，可分为自然条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环境等几个方面。

从狭义上说，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及其文化传统。

可以说，国情既是一个国家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的统一，又是其历史情况和现实情况的统一。

近代中国国情有两个十分突出的特征：一个是落后，一个是挨打。落后引发挨打，挨打加剧落后，由此引发出了中国革命。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中国革命运动的实践中产生 反过来又指导了中国的革命运动。

一、近代中国的落后及其社会根源

（一）从文明古国到落后的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但中国并非从来都是落后的。古代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自给自足的文明国家。古老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633页。

中国大地，养育着世界上最多的儿女，孕育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有着连续不断的五千年文明史，这在世界民族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根据最近十多年来考古的新发现，说明中国文明起源还不止五千年。如浙江的河姆渡遗址、湖南的城头山遗址，距今都在六千年和八千年以上。^①

一个民族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是她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文明史中优秀的文化。毛泽东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②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有优秀的文化，有优良的民族传统、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精神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中国的音乐、诗歌、舞蹈、戏剧、哲学思想都自成体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堪称是一个文明灿烂、生命力强大的民族。早在古代，当世界大部分地区仍处于蒙昧时代，今天高度文明的民族当时还被神权严格地统治着的时候，中华民族就已经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如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造纸。创造了先进的统一的社会文明：国家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道路统一。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但到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水平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

（二）近代中国落后的社会根源

纵观近代国际社会，先进与落后的根本差别就在于资本主义是否得到自由、充分的发展。

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就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唐宋时期就开始了，明末清初已经相当发达了。

① 《南方日报》1999年9月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622页。

但中国的资本主义却长期发展缓慢，几百年过去了，还是没有超越萌芽状态。

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什么会如此缓慢呢？

1. 经济原因

同西方相比，中国的封建经济基本上是地主制经济，欧洲的封建经济主要是领主制经济。

在中国，自西周时期开始实施的世袭性井田制遭到破坏后，封建地主阶级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对土地不仅拥有使用权，而且拥有所有权。这种封建经济形态一直延续到国民党统治时期。

在欧洲，直到公元 5 世纪，才完成了从奴隶制经济到封建性质的领主制经济的过渡（比中国迟了一千多年），开始了封建时代。领主代替了奴隶主成为统治阶级。但领主的土地是国王分封的，可以世袭，不能买卖。原来的奴隶变成农奴。农奴以一定的时间在领主公地上劳动，余下的时间经营自己的土地。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欧洲封建社会中，领主制经济一直占统治地位，直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以后才发生变化。

相比之下，中国封建的经济制度明显地不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发展的规律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地主经济既卡断了商品经济的资本积累（社会财富集中于土地交易），又造成了农民的极端贫困和落后，使中国经济长期停留在小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既不可能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大量的商品，也不可能为商品经济提供广阔的市场。

所以，在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尽管很早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没有合适的经济环境，以致经历了漫长岁月仍然没有超越萌芽状态。

2. 政治原因

封建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政治原因。

军令政令高度统一，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区别于欧洲封建社会的又一个基本特征。

相对而言，欧洲的政治是一种松散型的政治结构。对上来说，有国王和教会两个中心；对下来说，有庄园与城市两个中心。庄园是封建领主控制的，是农业经济的中心；城市是独立于封建领主的，是工商业的中心。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政治经济中心，有独立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有军队、警察、监狱，有自己的货币和度量衡。城市市民是自由民。欧洲城市的这些特点，使得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深厚、肥沃的发展土壤。

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始终是高度统一的，除了几个短暂的分裂、割据时期以外，不存在两个中心的状态。从古代到近代，中国的城市始终是统治阶级发号施令的神经中枢。中国封建制度的高度统一性，使得中央政权能够有效地对各个地方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进行干预。在军令政令高度统一之下实行的经济政策，有效地抑制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如：

专卖政策：即某些行业由政府垄断，禁止私人经营。在封建社会中，经济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但有些东西无法自己生产，如食盐、铁器等。这些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东西，由政府垄断。开始是盐铁，后来又扩大到茶叶、白酒等物品。政府把这些最有利可图的工商业部门从私人手里夺走，实行官营，从而堵塞了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道路，大大缩小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空间。

纳贡政策：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统治者把自己所需的消费品，超越商业程序，直接向生产者摊派。这又把商品经济的很大一部分，从源头上堵死了。

官工业政策：统治阶级公用和私用的必需品、军用品等数量巨大，纳贡政策满足不了需要，他们又不愿意从市场购买，于是就网罗工匠，集中建立起官工业，自行生产。这又把本来可以自由发展的一部分工商业从根本上扼杀了。

在这样的制度下，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就微乎其微了。

3. 文化原因

中国虽然创造了古代文明，但中国文化中也有它的消极一面。特别是其中的封建伦理道德，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例如，宣扬“农本商末”、“士农工商”的理念；实行八股取仕，引诱有作为的人尊孔读经，走仕途，完全忽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应用技术的发明创造；把中国看做天下的中心，孤芳自赏，夜郎自大，轻视四夷，缺少外向、开拓的精神，这些都严重抑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总之，中国的封建制度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窒息了商品经济的生机，扼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处于一种长期停滞的状态。这就是繁荣富强的古代中国，到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内在原因。

在中国逐步滑入落后深渊的时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借资本的力量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像魔术师一样，呼唤出巨大的生产力，使资本主义得到飞速的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并通过对外侵略，在世界范围内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

（三）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毛泽东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①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中国先后五次遭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中国社会最后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外部因素。这五次侵略战争是：

1840—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

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

1883—1885年，中法战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

1900—1901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626页。

这些战争都是列强单独或联合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他们在打败中国后，强迫中国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开放通商口岸，使中国从沿海到内地都向资本主义列强开放。列强不仅要求开放通商，还把中国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操纵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断了，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由此，马太效应发生了：先进者更加先进，落后者更加落后。先进者掠夺了落后者的财富，因而更加先进（如日本，原本是个穷国，通过甲午战争，索取巨额赔款，开始脱贫致富）；落后者受掠夺，变得更加落后。到 20 世纪初，中国掉进了一个无底的深渊：国土被瓜分，主权受践踏，经济被搜刮，人民受欺凌，还背上了一笔倾全国之力需要 39 年才能还清的战争赔款。^① 面对这种情况，不进行革命，中国就永无翻身之日。

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② 中国军民在鸦片战争中奋起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说明近代中国革命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步开始的，这也是随后一百多年中一浪高过一浪的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这种革命斗争的继续，也是这一斗争的高潮。毛泽东思想正是在中华民族的这种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产生出来，又成功地指导斗争走向胜利的革命理论。

指“庚子赔款”。1900 年（农历庚子年）8 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列强组成“赔款委员会”和“（中国）财源调查委员会”，研究中国可能担负的最大赔款数额。1901 年 9 月，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规定，中国付给各国赔款海关银 4.5 亿两。清政府一时无力付清，于是成为分成 39 年摊还的长期外债，年息 4 厘，本息共 9.82 亿两，从 1902 年起每年向各国摊付 2000 余万两。

^②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632 页。

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毛泽东曾经比喻说：马列主义是一棵大树，我们是一些枝叶；马列主义是总店，我们是分店。毛泽东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时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它在中国的传播并上升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既是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继续，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向西方学习的必然结果。

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一方面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促使中国发生革命；另一方面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反思，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伟大的革命运动，孕育出伟大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是革命先驱们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继续。也是革命先驱们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一）中国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的曲折历程

从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暴露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显示出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先进的中国人在痛苦的对比中扩大了眼界，正视了现实，自然而然地把西方作为学习的榜样。毛泽东说：“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

向西方学习，最初是由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来的。鸦片战争后，林则徐深感科学技术的重要，认为中国如能制造与侵略者相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1469～1470页。

的大炮、军舰，“则无患于制敌”。魏源把向西方学习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阐述说：“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①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还主张允许沿海商民“自愿仿设厂局”，保护出洋贸易；允许私人投资设厂开矿，发展民族工商业，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重要的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理念。它一方面间接地痛斥了封建统治者的无知与傲慢，另一方面给中国先进分子指出了—一个寻求真理、寻求救国救民的方向。近代中国先进分子，无不沿着这个方向去寻找真理。

继林则徐、魏源之后，洪秀全在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中，借用了西方的“上帝”，创立了“拜上帝会”，组织领导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1859年还颁发了西方式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主张革新政治，广开言路；效仿西方，准许私人投资开办工矿交通事业，奖励创造发明；主张办学校，建医院，发展救济事业；与外国通商，但不准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这些见解把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但无论是西方的“上帝”还是西方式的政纲，都救不了中国。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中，毛泽东看到了农民的伟大力量，进而认识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同时，太平天国的实践也提供了一条经验教训，就是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而必须把西方的理论中国化。

其后，在亡国危机的威胁下，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分化出的一些官僚中，掀起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揭开了近代中国采用西方先进技术的序幕，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中国人民从此得以更多地认识外部世界；同时，洋务运动也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使古老而停滞的中国出现了一线生机，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洋务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产生出一个官僚买办资产阶

魏源：《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卷三七。

级，它们严密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阻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给中国社会的发展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洋务运动既救不了封建统治者，更救不了中国，只能以失败告终。

1898年发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着重于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企图在保留封建统治根基的前提下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但维新变法一出台，便受到了顽固派的敌视与扼杀。维新运动仅仅推行了103天便告夭折，故被称为“百日维新”。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封建主义的统治既反动，又根深蒂固，不经过巨大的革命风暴是无法摧毁的；简单地移植西方的国家制度是行不通的。

维新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便让位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努力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孙中山先生学习了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方式，创立了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中国同盟会；提出了一个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创办《民报》，宣传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民族主义，即进行民族革命，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解除国内民族压迫，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为其目标。

民权主义，即创立民国，进行民主革命。以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为其政治任务。孙中山一方面借用了孟德斯鸠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另一方面又借鉴了中国古代官制的一些做法，把考试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把监察从司法中分离出来，创造了“五权分立”的国家体制。他把人分为三种：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将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

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即进行社会革命，改革封建土地制度。实现“平均地权”的方法是实行土地国有，革命胜利后首先核定地价，政府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地价税，以后因“社会改良进

步”引起的土地增值，则增值部分归国有；政府必要时可以按原核定的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资本主义模式的一个成果。他的“民族、民权、民生”同美国的“民有、民治、民享”如出一辙。同时，在政治体制上也掺进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东西。如“五权分立”，就是在西方的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再加上中国传统考试和监察制度结合而成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开始实施其革命方案：扫除封建习俗，保护人民权利，鼓励发展实业，改革教育，开放言论自由，发展新闻事业；还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权力属全体国民”，国民享有居住、财产、营业、言论、集会、通信、宗教信仰的自由和请愿、陈述、任官、考试、选举与被选举的权利，国家政治制度实行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制。

这些都表明，辛亥革命后所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一个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并试图推动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迈进。

但是，在革命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们却因找不到继续推进革命的力量，而终于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将革命果实拱手让给封建军阀袁世凯。中国社会由此进入北洋军阀黑暗统治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建立在军阀统治基础上的政治机构是对民主的严重歪曲，中国资产阶级的强国之梦成了泡影。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既未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也不能把中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独立富强的国家。在同盟会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中国国民党，到20世纪20年代初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旧式的民主革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领导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革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要进步、要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来指导。

（二）中国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马克思（1818~1883）和恩格斯（1820~1895）。他们一生著述很多。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生之年，其学说未能传到中国来。在中国，最早出现马克思的名字是在1899年。这年4月，由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上，登了一篇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写的文章《大同学》。文章中说：“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派，为德国之马克思，主于资本者也。”意思是说，有一位德国学者马克思，创建了马克思学派，主要著作是《资本论》。

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是孙中山的战友朱执信。1906年，朱执信在同盟会的《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系统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但在当时，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马克思主义也同其他西方学说一样，从开始传入中国，并为中国先进分子所注意进而学习和接受要有一个过程。纵观20世纪初期，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广泛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由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所推动：

1. 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信仰发生了危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先进分子对西方文明的信仰危机集中地表现出来了。

资本主义制度像魔术师那样，呼唤出生产力的大发展，也造成生产力的大破坏。在资本主义阶段以前，人类从未发生过世界性战争，在资本主义时代却发生了。在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世界主要国家分成了两大营垒，以欧洲为战场，腥风血雨地杀个你死我活，死亡1000多万人，受伤2000多万人，经济损失3400多亿美元，从而引起世界性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信仰危机。正如英国学者罗素所说：欧洲的破绽已经被欧洲大战揭露了出来。李大钊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

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①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受到了怀疑和挑战，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抛弃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中国思想界开始从生存竞争转向寻求互助共进的道路上。

2.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促成了空前巨大的思想解放潮流，“德赛先生”风行全国，民主与科学观念广泛传播，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3. 十月革命的影响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②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 1919 年和 1920 年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与中国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俄国在中国的特权。这个消息使中国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大受感动。从此，他们抛弃了向西方学习的兴趣，转而向俄国学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开来。

此外，中国人之所以广泛接受马克思主义，还由于马克思主义更容易融合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首先，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统一性和无限性的哲学思想与西方的其他多元化思想截然相反，它更接近于中国的“大一统”政治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容易接通。

其次，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否定了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引导中国人重新认识西方的思想和西方的文化，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摆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信仰危机，认识到西方制度的根本缺陷

① 《李大钊文集》，56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1471 页。

以及中国总是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根本原因。中国先进分子从此找到了一个以西方思想批判西方制度的有力武器。

再则，马克思主义给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使中国人能够重新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先进分子从马克思主义中既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也找到了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方法。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先进的中国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革命高潮，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三）马克思主义主流地位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中已成为主流。1920年前后，全国新出版的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刊物有三百多种。那时，社会主义成了时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成了中国先进分子追求的目标。特别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更加坚定了中国先进分子的社会主义信念。

1.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这次论战主要是发生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李大钊和胡适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指责思想界空谈主义，呼吁人们多研究些现实的社会问题。他说：第一，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情，主义只是留声机；第二，主义是没有用的，想要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问题作“根本解决”，那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第三，谈主义很危险，谈主义是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的。现在是“五鬼闹中华”，必须一个一个地解决它。

对胡适的攻击，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进行反击。李大钊说：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空谈主义的危险不在主义本身，而在于空谈主义的人。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是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的。中国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总体的解决，不进行根本的解决，就不能够前进。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号召民众，聚集革命力量，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能够一个一个地解决其他问题。

这场争论虽然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影响巨大。它基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导致很多社团的分化；一批激进的青年站在李大钊一边，后来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强调说：主义好比一面旗子，旗子树立起来了，大家才知所趋附。胡适也有一批追随者，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的政要人物。

2. 社会主义与基尔特主义的论战

1920年10月，梁启超邀英国学者罗素来中国讲学。罗素到中国后由梁启超的学生张东荪陪同，到全国巡回演讲。在演讲中，罗素大力宣扬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指行业工会。罗素主张通过发展实业，建立有资本家和工人参加的行业工会，可以和平进入社会主义。

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此时，他也接受了“社会主义”概念，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理想，但仍坚持社会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罗素的“和平长入”与梁启超的思想十分吻合，可谓一拍即合。梁启超和张东荪发表文章，主张解决社会问题应该采取“平和的或渐进的”办法，在现行制度下开发实业，增加富力，发展资本主义。然后，通过建立“基尔特”管理方式，和平长入“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的病症是贫穷，贫穷的原因不是剥削，而是天灾人祸。救治的方法，只有用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一条

路。而发展实业，只有依靠“绅商阶级”。要靠“绅商阶级”，就不能发动革命。如果发动革命，就是“伪劳农革命”，结果只不过是“过去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

梁启超、张东荪的这些观点不无可取之处，可惜处错了时代。

针对梁启超、张东荪的观点，李达、陈独秀等发表文章进行反驳。他们说：发展实业，增加社会财富，这些都对。但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发展实业创造条件。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不仅受本国的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而且受国际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压迫，民众中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革命的爆发乃是必然的趋势”，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和平改良的办法已经被无情的事实所证明：在中国行不通。

这场争论实质上是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争论持续了一年多，由于梁启超等既无法说明在中国条件下如何实行基尔特社会主义，也无法抹杀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下，中国资本主义无从发展的事实。所以，梁启超又一次打了“败仗”^①，基尔特主义者只好收场。

经过这场论战，使中国先进分子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念，明确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建立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3. 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争论的一方是陈独秀、李达，另一方是黄凌霜、区声白。

无政府主义鼓吹绝对自由：“自由组织”社团，“人人都可自由加入、自由退出”，反对一切国家，反对一切权威。五四运动时期，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书刊有七十多种。由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大同论大体一致，所以，很多进步青年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

梁启超（1873~1929）素称改良派宣传大师，在20世纪初同孙中山先生展开了一场论战，结果也是以失败收场。

想的同时，也相信无政府主义；特别是黄凌霜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思想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他们相信通过互助合作，搞工读互助团体，就能够达到世界大同

对于正在泛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陈独秀、李达等奋起批判。他们指出，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在于它不加区别地反对一切国家。对于推行官僚政治的国家，是应该反对；但对于铲除官僚政治的国家，不仅不应该反对，而且还应该维护“推翻了资产阶级国家之后，一定要建设无产阶级国家；否则，革命就不能完成，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针对所谓的“绝对自由”，他们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由只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自由”。一个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可以自由退出；但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内的意见不同分子或团体，又有什么办法可以自由退出呢？一盘散沙的现象，绝对不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

经过这场争论，基本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使不少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

刘少奇在谈到这场争论时说：“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到处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拥护者争论着，斗争着。马克思主义直至在各方面克服无政府主义以后才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雄伟的力量。”

经过这三次论战，使更多的人信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基本确立起来。

这样，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曲折历程中，中国人民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就。

刘少奇：《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